

周民锋 著

当代中国 意识形态观研究

DANGDAI ZHONGGUO
YISHI XINGTAI GUAN YANJIU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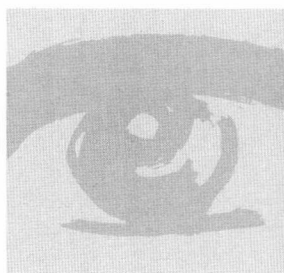


社

周民锋 著

当代中国
意识形态观研究

DANGDAI ZHONGGUO
YISHI XINGTAI GUAN YANJIU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周民锋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ISBN 978-7-01-010855-1

I. ①当… II. ①周… III. ①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8964 号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

DANGDAI ZHONGGUO YISHI XINGTAI GUAN YANJIU

周民锋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28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855-1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我在2009年完成本书初稿时,赫然发现自己的人生恰好被那条1978—1979年的年线等分。换言之,当代中国的两个30年,正好跟我的生物学历年龄重合。

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关心和疑惑,发生在前30年里。

那时,政治课老师说,阶级斗争理论是革命的意识形态;“文革”的现实,则一直在证明意识形态领域是阶级斗争的主战场。

那时,年少愚鲁,我却还总想弄清楚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那时,可读的书只有毛著和几本马恩的单行本;尤其是后者,读起来还半懂不懂的。

1969年,我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精神现象学”的评述,牢牢地抓住了我。我当时想,既然人类历史是不断地辩证发展着的,既然马克思只是揭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那么,合逻辑的下一步就应该去研究人类精神的发展规律了。那时,我即将下乡,住在学校空荡荡的第四宿舍的某个房间里,竟然被这个念头折磨得热血沸腾。我庆幸,在即将走向动荡不定的未来之时,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根精神支柱。

几年以后,我在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973年出版)中,为上述念头找到了理论的根据;我又在海克尔的《宇宙之谜》(1974年出版)关于“生物重演律”的说明中,为上述念头找到了科学的依据。

不过,那时我绝对不可能想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两种不同的所指。

2006年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将课题名称定为“中国和平崛起时

期的意识形态观研究”。获批之后、动笔之前,我去北京做调研、请教专家学者。在与中央编译局的鲁路先生交谈时,我请他为我提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那一段关于唯物史观论述的德文原文。之后,我才知道,中文“意识形态”既是 Ideologie (Ideology), 又是 Bewußtseinsformen。此时,我内心豁然开朗,知道该怎么做我的课题了。

1978年年末,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变革。同年,我进了大学哲学系读书。

1979年,我第一次接触西方哲学史。我发现,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客观逻辑的明晰性,决定了每一个哲学家及其思想在历史上占有着一个只能属于他的位置。在那里,以为对思想的评价只能主观的、随意的常识失去了立足之地。黑格尔的高明之处,是以逻辑的系统性来保证每一环节(概念)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的英明之处,则还以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的互证来加固思想的客观必然性。

在之后的若干年里,我试图寻找隐含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客观逻辑,试图理解中国社会中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互动关系。然而,在这条艰深幽远的道路上,虽有点滴的心得,却无系统的成果。因为,跟顾颉刚先生等前辈相比,自己的国学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988年,我完成了关于康德研究的硕士论文,发现他阐述了异于西方“推论知性”的另一种“直观知性”。黑格尔正是从后者发展出了辩证逻辑,并认为其源自斯宾诺莎的具有“东方的流风遗韵”的整体思维。这使我相信,一般简单地归之于西方的“推论知性”和归之于中国的“直观知性”,实为人类所拥有的两种具对称性的思维类型及要素,它们既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中国,区别只是在于各自有着不同的组合关系罢了。

之后,我从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史观中获得了某种确证: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原本就有一条贯通古今的线索。不过,这条线索一直被更为强悍的西方理性主义的脉络遮蔽着。而此两者其实就是“直观知性”和“推论知性”的别称。我在2002年出版的《走向大智慧》一书中,梳理了上述两者之间的联系及其演化逻辑,并促使我进一步追寻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称关系。

中国社会在最近 30 余年里的发展,为我超越单纯从理论和逻辑层面思考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生活的基础。

随着经济生活的丰富和发达,社会精神生活远远突破了前 30 年里制定的桎梏。社会意识形态不只是指不同的“主义”Ideologie(Ideology),还有内涵极为丰富的 Bewußtseinsformen。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深入,对 Bewußtseinsformen 的认识大大突破了书本上的定义。认识隶属于不同文明形态的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机制,必将有助于我们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现代化。

我们是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对于我来说,负责任的态度是必须认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本义是什么?它对当代中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我再次感到庆幸,在我退休之际,完成了这部书稿。我想,我尽力了,尽管做得很不够。

承蒙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本书得以面世;感谢殷叙彝先生、罗传芳先生的推荐;感谢方国根先生的好意及辛劳。即便是以新、旧版的经典对照着查对本书中的引文,也是一项烦琐而费力的工作;当然,还要感谢所有关心我并为我提供各种帮助的同事和朋友;否则,历时近 6 年的工作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应出版社方面的建议,我将书名更改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新选的限定词只强调时间和空间,似乎更加“学术”一些。

作 者

2012 年 3 月 27 日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和平崛起	(1)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	(1)
一、“横”和“纵”的交错	(1)
二、“硬”和“软”的配合	(3)
第二节 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	(5)
一、国家与文明	(5)
二、国家的崛起与文明的崛起	(6)
三、文明的崛起与重新崛起	(10)
第三节 中国和平崛起时期的意识形态观研究	(13)
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和平崛起时期	(13)
二、中国和平崛起时期的意识形态观研究	(16)

上篇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观

第一章 重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21)
第一节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个来源及其两重含义	(21)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个来源	(21)
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种用法	(23)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重含义	(25)
第二节 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演化及其体系	(30)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 年)	(31)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年)	(32)
三、《资本论》(1867 年,第 1 卷)	(34)
四、恩格斯后期书信(1890—1894 年)	(35)
五、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内在逻辑	(36)
第三节 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由来的学理逻辑	(38)
一、知识论及观念学:从弗·培根和特拉西到康德	(39)
二、精神现象学:黑格尔	(41)
三、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	(44)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观研究	(48)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观	(48)
一、什么是意识形态	(48)
二、什么是意识形态观	(52)
三、意识形态观研究中的意识形态	(54)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观研究	(58)
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前提	(58)
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的实践需要	(64)
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68)
四、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的问题域	(71)

中篇 社会意识形态观问题研究

第三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观研究	(77)
第一节 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征	(77)
一、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维度	(77)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意识形态系统的特质	(81)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系统的特质	(85)
第二节 当代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观问题	(88)
一、计划与市场之争	(88)
二、公平与效率之辨	(90)
三、和谐与科学发展	(92)

第三节 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观问题	(94)
一、国家与个体:对发展动力的新解释	(95)
二、国家与社会:对发展机制的新探索	(97)
三、社会与个体:对发展模式的新拓展	(102)
第四章 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	(105)
第一节 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	(106)
一、表达国家意志	(106)
二、参与制度建设	(108)
三、引导实践方向	(113)
第二节 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	(115)
一、表达社会共识	(116)
二、化育社会道德	(120)
三、维护社会架构	(123)
第三节 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	(128)
一、表达时代精神	(129)
二、沟通民间心理	(132)
三、提供精神动力	(136)

下篇 文化意识形态观问题研究

第五章 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其对象	(143)
第一节 文化意识形态概念	(143)
一、来源: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	(143)
二、逻辑:文化意识形态的视角	(147)
三、意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	(150)
第二节 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	(155)
一、概念系统: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的互补	(156)
二、样本选择:中西文明形态的参照比较	(162)
三、对象呈现:历史路径和现实表达的贯通	(167)
第三节 文化意识形态的演化路径	(173)
一、远古:人类文化意识形态的起源	(173)

二、古代:中西文化意识形态的分野	(179)
三、近代:中西文化意识形态的演化	(187)
第六章 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历史创新	(194)
第一节 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历史创新	(195)
一、特征: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历史创新	(195)
二、条件:中国传统、西方传统、马克思主义	(198)
三、目标: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	(202)
第二节 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历史创新的基础	(208)
一、哲学—自然观: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干	(210)
二、伦理—社会观: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干	(217)
三、价值—人性观:人类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	(224)
第三节 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历史创新的实践性问题	(232)
一、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232)
二、改造传统的伦理观	(237)
三、教化和谐的人性观	(244)
结 语	(252)
一、本文的叙述逻辑及基本结构	(252)
二、逻辑及结构背后的方法	(253)
三、马克思的理论主旨	(256)
四、关于文化意识形态	(259)
主要参考文献	(264)

导 论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和平崛起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

一、“横”和“纵”的交错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21 世纪。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纪？迅速发展着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坐标点上？这样的发问像是某种宏大叙事的开场白。不过，对于从现实生活出发的哲学研究来说，同样需要从研判这些实际的问题开始。

在空间维度，即从横向看，其一，从 20 世纪末开始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仍在继续，在科技、商贸、金融、政治诸领域中发生的全球性的若干重大事件正在不断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其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依然最为强劲，关于它的崛起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话题。

在时间维度，即从纵向看，其一，就世界而言，“专家们常常将今天的全球化描述为‘第二次全球化’，以便与 1870 至 1914 年之间的‘第一次全球化’相区别。在第一次全球化中，崛起的经济大国是美国，而英国是当时全球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但现在，中国既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资本来源国”。^①其二，就中国而言，它在这两次全球化中的状况有天壤之别：在前一次全球化时代，中国是一个不断遭受外来打击、日趋腐朽的中央帝国；而在这一次全

① [英]马丁·沃尔夫：《中国需要重新平衡经济增长》，英国《金融时报》2007 年 6 月 6 日；《参考消息》2007 年 6 月 12 日，第 16 版。

球化时代,中国以其持续两位数的增长率正在创造世界经济发展速度的奇迹。黄仁宇说:“中国过去 150 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 10 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①

“横”与“纵”的相交,便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演化的历史进程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相互重叠产生的坐标点。对于中国来说,它的经济崛起恰逢一轮新的全球化时代,机会难得且已获益匪浅;对于世界来说,古老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且正在改变全球的经济、政治版图,而且谁也无法预料,人类文明的演化轨迹将会因此而发生何种改变,其意义自然无可限量。

当然,应该承认,无论以“中国崛起”、“中国和平崛起”,还是以“中国和平发展”来称呼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目前可以确认的只是它的经济在崛起。相比而言,经济是部分,文明是全体。当然,在唯物史观看来,经济的崛起可以而且必须是文明崛起的前提和基础。再说,认识到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认识到中华民族在近代曾经饱尝过的屈辱,而无论是“辉煌”还是“屈辱”都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前进的内在动力,那么我们能否期待,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将会迎来中华文明在现代条件下的重新崛起?如果可以这样期待,就需要有一种更为宽阔而深远的视界,去认识并推进这一伟大的进程。

通常,人们只会在世纪末回顾以往,而不会在世纪初为尚未展开的新世纪撰写历史。因为,“历史”这个概念只是意味着“过去”。然而,托马斯·弗里德曼在 2005 年出版了一本副标题为《21 世纪简史》的新书。书中说:“哥伦布归国后向国王和王后汇报说,地球是圆的。他也因这一发现而名垂史册。而我回到美国时,只是悄悄地和我的太太分享了我的发现:‘亲爱的,我发现这个世界是平的。’”^②托马斯·弗里德曼居然如此自信地认为,此书的正标题可以预先道出 21 世纪的历史性主题:《世界是平的》。

最初提出球形大地学说的是古希腊人,而证明这一点的却是近代的大航海。1492 年,哥伦布到达巴哈马群岛;1497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1516

①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 1997 年版,中文版自序,第 7 页。

②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 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 页。

年,麦哲伦绕行地球一周。历史学家认为,“1500 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的远航探险时才开始。”^①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有了工业革命,有了全球市场,有了“日不落”的英帝国,有了西方近代文明,也就有了第一次全球化。从那时起,所谓的中东和远东,拉美和非洲,与西方构成了垂直排列的另一极,彼此间有一条鸿沟。换言之,那时的世界是上下分层的。

在托马斯·弗里德曼看来,所谓世界在变平,即“世界开始从垂直的价值创造模式(命令和控制)向日益水平的价值创造模式(联系与合作)转变”^②。这种经济方面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为各个民族“站到同一起跑线上”提供了可能。弗里德曼不是一位学者。不过,他有着一名优秀记者的视力和嗅觉。再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崛起恰好在证明这个世界的确在变平。

二、“硬”和“软”的配合

中国的经济在经过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之后,其规模排名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2003 年年末,中国高层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尽管以后改称“和平发展”,不过,它们所传达的基本信息却是一贯而确定的: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客观地评估自身实力、谨慎地谋划未来发展的时候了。

此后的几年间,国内出现了大量有关中国崛起问题的论著。张剑荆认为,应当研究这样两个问题:“(1)这一新兴力量(指中国——引者注)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2)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相比之下,“后者更为重要一些”。^③

那么,应该如何评判中国现有的综合国力? 几种有代表性的评判方法是:黄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历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 页。

② 弗里德曼认为,当今正在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是:柏林墙的倒塌和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建立、Web 的出现和网景上市、工作流软件、上传、外包、离岸经营、全球供应链、内包、Google 和雅虎和 MSN、数字移动技术。参见[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 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154 页。

③ 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硕风国力方程、胡鞍钢国力方程、富克斯国力方程。张剑荆认为,后两者“实际上只是估算物质力量的方程,而不是‘综合’国力的计算”;而前者除了计算“硬国力”之外,还“考虑到了‘软国力’和‘协同力’。但是,对于如何综合这些力量,他给出的公式也同样没有说服力”。^①

综合国力包括“硬力量”和“软力量”。用哲学的话来说,前者是物质的、有形的;后者是精神的、无形的。当然,这种表述未必准确。

张剑荆说,最先提出“软力量”概念的是约瑟夫·奈。在奈看来,软实力就是“能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能力。它“强调与人们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它是引诱和吸引的能力。”“软实力很多产生于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我们的文化、我们在国内所实行的政策以及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②

不过,上述的“软力量”看来仍是工具性的,它从属于并服务于“硬力量”想要达成的同一目标。也许,当世界正在变平,利用“硬力量”去谋取不对称的垂直性权力终将会失去其合法性,所以,追求“引诱和吸引的能力”,便成为一种顺应时势的选择。

张剑荆同意约瑟夫·奈关于“软力量”的定义,并具体描述了它的两个特征:“一是罗致行为能力或方案能力,它的方案构成了一个体系共同分享的意识形态;二是体系能力和合众能力,通过这个体系,国家摆脱原始丛林状态进入到体系文明的世界中。”因为,“我们面临的世界是一个竞争中的主权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有待解决的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一个国家的软力量就体现在能否为体系中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③

显然,约瑟夫·奈和张剑荆都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即一个主权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向外部世界显示自身力量的层面来界定“软力量”概念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企图借以维持已是强国的强势地位,即在继续保持“硬力量”优势的同时,更好地发挥“软力量”的作用;后者则为解决中国在国际间崛起的问

① 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②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悖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9—11页;转引自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

③ 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题,主张在不断增长“硬力量”的同时,还应培植或生成自身的“软力量”。由此可知,对于有不同国情的国家来说,“软力量”的功能是一致的,即都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但是,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拥有不同文化资源的国家来说,它们可以追求的、最终可以拥有的“软力量”的内涵则会有所不同。

包括约瑟夫·奈和张剑荆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指出,“软力量”与文化有关。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文化的产物。所以,不同的文化系统会生成不同的“软力量”,它们在价值观的内容、发挥作用的方式、追求的最终目标等方面均会有所不同,它们之间甚至可能发生冲突或较量。然而,相同之处则在于:如果把“软力量”的生成看作只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认为可以简单地通过投入“硬力量”来打造“软力量”的话,那么,这样做显然是过于肤浅地看待这个问题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软力量”似乎应当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外显的,其从属于国家综合国力的部分;其二是内在的,它存活于一国的文化系统中。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于是,要研究中国的崛起及其未来发展,应当关注它的综合国力的状况;要研究中国的综合国力,不应忽视它的“软力量”方面;要研究中国的“软力量”,则应当注意:在当下发展着的现实国情中,看到的只是外显的部分;只有在历史地演化着的中华文化中,才能找到其内在的源和流、能量和根基。

第二节 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重新崛起

一、国家与文明

国家是文明的产物,又是文明的载体。历史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会出现国家,而国家出现之后便会使一种文明凝聚成形,并为它的发展和繁荣提供并积累创造性的成果。

两相比较,国家有显性的组织、确定的疆域、物质的力量、特定的种族,而文明则只能透过这些要素的组合方式表现出来,或者说文明是隐藏在所有这些要素背后、有形而无痕的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文明均不急不慢地走着自身演化的道路,并影响到作为其载体的国家的兴衰成败。不同文明的轨道有着不同的特质,从而决定着其所属国家的文化特征。

通常以为,是国家的兴衰导致了文明的起落,所以,国家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实际上,两者的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简单。诚然,一方面,历史表明,由人执掌的国家所具有的能动性的确能够改变国家的组织、疆域、力量、人口,筹划并发动各类行动或运动,创造出各种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从而塑造或改变一种文明的形态;然而,另一方面,历史同样表明,不同的文明形态即便还在古代雏形初现的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拥有调整人类活动方向的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在有意和无意间告诉一个民族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崇尚什么或应该鄙弃什么,它的力量甚至使那些执掌国家命运的统治者都不敢违背。正是那些在文明演化的长河中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的价值标准,才是超越朝代和国家的力量,并塑造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一种文明形态。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研究中,用“历史精神”的概念来表达支配着人类历史的那种强大而一贯的力量。它善于用“理性的狡计”使那些狂妄自大的帝王将相成为达成历史目标的玩偶和工具。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则通过探寻“社会形态”的演化规律来对这种历史必然性作出表述。显然,无论是所谓的“历史精神”或“社会形态”的演化规律,都是指超越国家层面的东西,都是指只有在一种文明形态演化的全过程中才能展示出来的东西。所以,国家与文明,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研究对象。^①

二、国家的崛起与文明的崛起

既然国家与文明有别,国家的兴衰与文明的起落也就不能简单地等同。所以,“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重新崛起”同样不能简单地等同。

“中国崛起”指一个国家尤其是指它的综合国力的崛起;“中华文明重新崛起”则是指一种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文明通过历史创新实现的重新崛起。

观察“中国崛起”的过程可以仅限于当代;研究“中华文明重新崛起”则要跨越几个时代,甚至需要贯通整部历史。

研究“中国崛起”,旨在探讨中国综合国力如何发展、如何使用,以及如何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思考“中华文明重新崛起”,则需分析中华文明的演化

^①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讨论人类文明史,而在法哲学中讨论国家;同样,马克思、恩格斯有专门论述国家的学说,还有专门阐述人类文明演化的理论。所以,他们都不把国家和文明混为一谈。

轨迹,讨论这一轨迹将会对当代中国的崛起发生何种影响,以及当代中国的崛起将会使这一轨迹发生何种改变? 相比而言,前者属国情国力、国际政治的研究,后者则涉及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文化哲学等学科。

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同时研究这两种“崛起”,并使之相互参照?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第一,如前所述,为促成“中国崛起”,就需要不断地挖掘、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这就必须不断地耕耘作为其根基和土壤的文化与文明。

近年来,人们渐渐发现,中国提倡的“和谐世界”与美国主张的“秩序世界”恰好形成某种对比。^① 这是有着不同内涵、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种“软实力”之间的比较。

“秩序世界”的理念,建基于既定的当代国际关系格局,源于西方中心主义政治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相结合的西方近代文化观念。在当代,一方面,日益强化的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兴国家经济的强劲崛起,不断地消解着垂直性权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西方思想界对传统的政治及哲学观念的不断反思,使“秩序世界”的理念遭遇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挑战。当然,这一演变的趋势未必是单向的、线性的。换言之,每一种文明或文化都会有自我修复与自我刷新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及文化观念的频繁交流、碰撞,为各种文明的演化提供着机会与可能。

相比之下,“和谐世界”的理念则是中国文化观念的产物,它具有悠久的传统。一方面,它顺应当代科技、商贸的发展使世界变平这一趋势,提倡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公正,因而会获得普遍的拥护;另一方面,当代世界仍是一个充满利益冲突的矛盾复合体,“和谐”理念的确立及被广泛接受尚需不断地成功应对各种复杂的国际事务,尚需成功地展现自己的独特价值。所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同样会遭遇挑战,而成功地回应这种挑战将加速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

第二,为使“中国崛起”始终拥有充沛的动力,就需要研究它之所以发生的前因后果、动力来源、终极目标,为此,必须认识中华文明的演化轨迹。

在历史的变焦镜头下,1840年、1949年、1978年、2003年是“中国崛起”大事记中的四个重要时间节点,它们连贯地展示出当代中国崛起的历史脉络。

① 参见谭中:《中国“和谐世界”与美国“秩序世界”》,《参考消息》2007年5月30日。